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项目编号: ZZyyy13027

许静波 著

石頭記

上海近代石印書業研究 1843—1956

許靜波題



蘇州大學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项目编号: ZZyyy13027

○许静波 著

石頭記

上海近代石印書業研究 1843—1956

許靜波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 /
许静波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12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ISBN 978-7-5672-1149-0

I. ①石… II. ①许…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上海市—1843~1956 IV. ①G23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941 号

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

许静波 著

责任编辑 董 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市友新路 28 号东侧 邮编:215128)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14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149-0 定价: 49.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了。但就我所知，上海石印业的兴盛期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即 1905 年科举废除之前。其时上海开埠，中西文化碰撞，商业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社会文化需求旺盛，印刷业蓬勃发展，石印业也应运而生。

序 熊月之 言



与铅印相比，石印在近代出版史上是较被忽视的一部分。盖在人们印象中，石印出版的黄金期较短，出版物质量不高，近代诸多大家之代表作，几乎无一是以石印形式出现的。

各种近代出版印刷史著作，关于石印的研究多集中在 1905 年废科举之前，涉及的出版机构主要是点石斋、同文、蜚英馆几家专营石印的书局和商务、中华等几家兼营石印的书局。然而，这些研究很难反映上海近代石印之全貌。上海开埠之初，麦都思即于 1844 年开始石印书籍，其后石印书籍源源不断。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石印出版物涵盖古籍、西学、小说、戏曲、日用杂件等各种门类，浩如烟海，佳作精品亦复不少，同文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商务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中华版的《四部备要》，均为其中佳作。为数众多的石印书局是上海近代中小书局的主体，多具有浓厚的传统书业特色，又浸染着新的时代气息。

这些情况表明，近代上海石印书业有较大研究空间。2008 年，许静波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随我研习上海史。他的硕士论文关注的晚清上海洋场才子，对近代出版业有所涉猎。我遂建议他以近代石印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静波知识面较宽，思维敏捷，也肯下功夫。他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石印书局和书业公所史料，翻阅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等馆藏石印书籍，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亦向诸多海外名家求

教。几度寒暑,他编纂了含书数千种的上海近代石印出版物经眼录,发表了许多篇相关论文,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书是这一论文的扩展与完善。

静波认为,石印业的生产成果,虽然物化为书籍,但如不厘清其行业之生产流程、机构沿革、经营模式等背景的话,则很难解释石印书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纷繁的形态和内容。所以,本书以文化史为核心,又有浓厚的经济史和传播史色彩。

书中清晰地梳理了百多年间上海石印书业的历史,对废科举后的石印生产着力尤多。静波认为,中国近代化转型模式多种多样,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间转型的层次、顺序、程度均有所不同,与商务、中华等大型出版企业相比,众多中小石印书局渐进地、反复地进行近代化变革,有其独特的价值。他从技术层面审视石印的兴衰,尽可能地复原了众多出版印刷史著作中语焉不详的石印生产流程,总结出石印生产核心化学反应公式,重视实验室原理和工业化生产之间的区别,并对石印石、主辅机械、油墨、印刷纸等生产设备的海关进口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从制版效率的角度审视了铅印与石印的交替兴衰之谜。静波认为,作为一个行业,管理者生产经营模式、营销策略、业间扶助等,都对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书中考察了石印书局局东和经理人员构成、混合化经营、局址设置和销售折扣背后的营销理念,探讨了石印书局工人运动情况,分析了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行会组织书业公所的历史与作用。这些都是深入探究后的洞见。

尤可称道的是,以往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于许多中小石印书局,往往只知其名和若干出版品,但对其历史不甚了了,静波利用书业公所调查资料、报刊告白和书籍版权页资料,阐幽发微,整理出鸿宝斋、校经山房、燮记、章福记、会文堂等书局的历史。

总之,这是一部下了硬功夫、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富有学术含量的力作,文字亦生动可读。它的出版,对于近代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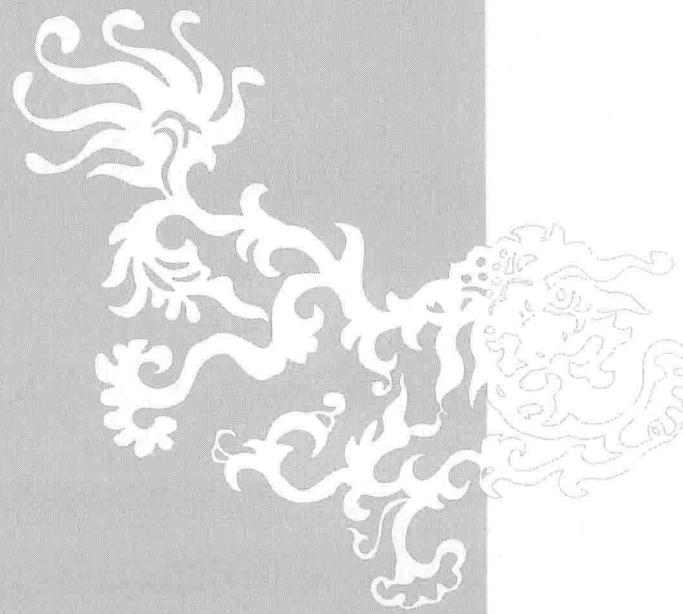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近代社会变迁下的上海石印书业	23
第一节 近代早期西学东渐与石印技术引介	25
第二节 太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文化恢复与上海石印书业的发端及兴盛	39
第三节 废科举与民国间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转型	55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造运动与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终结	69
第二章 近代上海石印书业的工艺与技术	81
第一节 石印技术的发明与近代文献中的记载	83
第二节 石印原理与工艺探原	94
第三节 石印书业的设备与原料	102
第四节 竞争百年:从制版效率看石印与铅印之争	125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上海石印书局	137
第一节 来源多元化的石印书局局主	139

第二节 上海石印书局的企业管理	144
第三节 石印书局的工人群体	167
第四章 尴尬的“守门人”: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书业公所	183
第一节 书业公所的创建与制度	186
第二节 书业公所的近代特色	193
第三节 书业公所的局限性	200
第四节 书业公所局限性的成因	209
第五章 上海近代石印书局众生相	215
第一节 综合性书局石印部的生产:商务印书馆	217
第二节 中小型石印书局的代表:鸿宝斋书局	230
第三节 四家石印书局考略	244
结论 历史高音下的复调现实	251
附录 1: 上海近代石印书业年表(1798—1956)	259
附录 2: 石板印图法	267
附录 3: 照相石印法	274
附录 4: 书业历史	281
附录 5: 上海市书业合营工作计划	288
附录 6: 民国时期上海近代石印书业局主、经理出资人情况表	290
附录 7: 石印书籍章程草约	299
参考书目	302
后记	307

引
论



一、成绩与缺憾：上海近代石印业研究史综述

自光绪三年(1877)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格致汇编》十月号撰文《石板印图法》介绍石印技术以降,57年后第一部涉及石印史的学术著作才得以出版。民国二十三年(1934),贺圣鼐、赖彦于的《近代印刷术》^①一书可谓石印史研究的开山之作。2011年,学术界第一本系统研究上海近代石印史的专著问世,是为杨丽莹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晚清民初上海石印书籍出版专题研究》,该著系统研究了上海近代石印出版的技术、成本、书局、内容,不过总体来说,这本博士后出站报告除了关于石印出版物内容的讨论,其他部分因循前人研究之处较多,且并未对上海近代石印业的发展谱系进行归纳和总结。除杨著外,近百年的研究多附从于印刷史、西学史,其成果形式又以史料集成及单篇论文为多。国内学界的研究可概分为四类:

第一类,中国出版印刷通史及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通史中关于近代石印技术的部分。《近代印刷术》可谓是该类的代表,该书上编第三章中介绍了石印技术在中国的发轫,石印技术的种类,石印所用的平版印刷机等问题。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该书原本探讨石印的内容不多,而在200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之际,由韩琦增补了不少内容。1999年张树栋等著的《中华印刷通史》^②第十三章第二节“平版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中“石版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部分首先探讨了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当为19世纪30年代初,接下来以“绘石石印”、“彩色石印”、“照相石印”为纲介绍石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印刷出版机构”、第十四章第一节“印刷出版机构的建立”介绍了土山湾印刷所、点石斋、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里面部分涉及了这些出版印刷机构石印书籍的内容,但是该书出版机构和印刷

①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中的一种,亦被收录“万有文库”。

② 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技术是分开来谈的,没有体现出具体出版机构在技术演进上的过程,也没有研究石印出版物内容上的特点,所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欠缺。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①对石印技术的发展和石印出版物的内容研究不多,其专注于各石印书局的介绍,在第二卷中关于解放区石印出版机构的研究值得注意,但是总体来说多泛泛之论。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的《中国近代出版史稿》^②的第三章第四节“石印术的传入”和第四章第二节“民族出版企业的出现”分别对近代石印技术的发展和早期石印书局如同文书局、蜚英馆、拜石山房的情况做了一点介绍,可惜原始资料和创见较少。

第二类,西学传播研究专著及出版印刷史专著中关于石印史的部分。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③是一部研究西方科技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著作,在第二章“西学从南洋漂来”中对传教士早期在南洋利用石印出版中文书刊做出了研究;第三章“门户洞开以来”亦对上海墨海书馆的石印活动做出了介绍。汪家熔所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中的第七章“文化积累千秋功业”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核心对近代上海石印书业进行研究。和其他著作相比,汪著更加重视民国时期上海石印书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落脚点在于两大重量级出版机构,所以忽视了对中小石印书局的研究。

第三类,各种近现代出版印刷史料中所收集的关于石印史的资料。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④中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贺圣鼐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该文是抄录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一书相关内容而成;二是《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张静庐在两篇文章中补充了不少注释,这些注释和第二篇文章部分材料后收于梁长洲《近代各处印刷业情况》一文,梁氏又增补了部分来自于《北华捷报》的史料。汪家熔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⑤第三卷近代部分也收录了不少关于石印的史料。徐

① 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中国近代出版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

④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8),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之近代部分第三卷:《中国出版史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蜀、宋安莉编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①影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发行目录、征订样本一百零七种，其中就有千顷堂、古书流通处、申报馆、同文书局、报经堂、振新书社、扫叶山房、章福记、鸿宝斋等重要石印出版机构的书目，但是这些书中除了“同文书局石印书目”外，并不标明书籍的印刷方式。

第四类，石印史研究相关论文。韩琦、王扬宗的《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②据《中国文库》资料研究石印术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和《格致汇编》研究早期石印知识的引介，并指出两本江南制造总局没有刊印的石印知识介绍书籍：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的《石板印法》和傅兰雅口译、王德均笔述的《石板印法略》，提出墨海书馆为上海最早石印之出版机构，这些史实的考证是很有见地的。潘建国《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③研究的是石印中的一项高端技术五彩石印，他主要根据《申报》上的广告，对各五彩石印书局及其同业组织做了研究，然而没有接触太多五彩石印出版物实物。潘建国另有《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④从图像、印刷、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审视石印通俗小说在晚清的流行，同时也指出当时的石印小说亦有伪劣盗版的问题。石印是一种工业技术，故有研究者从技术考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汪海霞、方晓阳的论文《〈格致汇编〉所载石印“流质墨”初探》^⑤根据傅兰雅《石板印图法》中对“流质墨”的介绍，分析其化学成分与制作工艺，在今日重新制作出傅兰雅所介绍的这种石印墨。其后汪海霞的硕士论文《石版和铜版印刷术的传入与影响及模拟实验研究》^⑥亦根据《石板印图法》进行石印模拟实验，通过对文献中原料成分的分析与石印技术的再现，发现傅兰雅时代的石印工艺流程和后来上海石印书业的基本相同。

在海外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梁元生总结20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

① 徐蜀、宋安莉：《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367页。

③ 潘建国：《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④ 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⑤ 汪海霞、方晓阳：《〈格致汇编〉所载石印“流质墨”初探》，《中国印刷》2004年第2期。

⑥ 汪海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究时,提出了四个研究取向:(1)“大一统中国”的退隐,地方社会和地方文化的被重视;(2)政治史、制度史及外交史的研究退潮,社会经济及社会文化史则成为学术主流;(3)六十、七十年代流行的农村研究已经降温,八十年代转向都市,尤注目于“市民社会”; (4)以前的研究重点在于描述和解释“变迁”(change),近年的研究则比较重视持续性的发展(continuities)。^①可以说,关于晚期中华帝国时代印刷史的研究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些取向的转变,近年来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1996年《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专号^②;2002年包筠雅的《为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 - 17th Centuries]*)^③;2004年周启荣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④;2005年周启荣和包筠雅合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⑤,这些著作借鉴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细致地研究了晚明到晚清中国印刷业的方方面面,同时又跨越了印刷史与出版史的界限,切入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研究模式和话语,并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台湾学界,王尔敏、潘光哲等学者都有相关的论著问世。^⑥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之前,只有美国学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所著《谷腾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① 梁元生:《史学的终结与最后的“中国通”——从现代美国思潮谈到近年来的中近史研究》,《学人》第五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页。

②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June, 1996), pp. 1 – 200,该专号中有收录了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贾晋珠(Lucille Chia)、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Kai-wing Chow)、贝尔(Bell, Catherine M.)的六篇文章。

③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④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⑥ 可参看王尔敏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4期发表的《〈酬世锦囊〉之内涵及其适用之人际网络》,第30期发表的《〈营谋小集〉与商贩经理知识》,第31期发表的《清代小商贩稀珍史料五种》,第33期发表的《〈庄农杂字〉所反映的农民生业生活》,第36期发表的《中国民间市井营造工匠日用之〈鲁班经〉》,以及专著《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岳麓书社2002年版。潘光哲的论著有《〈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以〈时务报〉的译稿为例》,《史林》2006年第5期,第1—18页;专著《华盛顿在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①中的第二章“双面拓荒者：上海石印业的黄金时代，1876—1905”(*Janus-Faced Pioneers: The Golden Age of Shanghai's Lithographic Printer-Publishers, 1876—1905*)探讨了上海近代石印史的问题。作者认为石印书籍价格低廉、以缩印技术获得科举考生的喜爱，还能保留书法之优美，这些使得西方印刷技术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铅印技术不过是乘石印开辟之东风罢了。该书作者为美国学者，所以在书中较有国际视野，引用了法国、英国石印的情况与上海做比较，后面具体研究了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三个石印出版机构，并将1905年后石印的衰退归结于大众欣赏口味的变化、石印技术机械化程度低、石印出版机构盲目雇工等。凭借这本著作，芮哲非获得了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所颁发的“最佳亚洲人文科学研究奖”(The 2003—2005 Book Prize “Humanities”)。^②

以上研究成果都丰富了我们对于上海近代石印生产的认识，但是在成绩的背后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概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上，重史实轻史论

由于目前对上海近代石印生产的研究多散见于各印刷通史、西学东渐著作及单篇论文，所以既有成果更加偏重于对具体史实的探讨。如中国石印史的开端问题，贺圣鼐、赖彦于所著的《近代印刷术》认为“土山湾是中国石印技术之发轫”。该说影响很大，净雨的《清代印刷小纪》^③、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④和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的《中国近代出版史稿》^⑤皆循此论。熊月之先生《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根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①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② 许静波：《当技术遭遇文化——读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1876—1937〉》，《史林》2011年第1期。

③ 净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参见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④ 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⑤ 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中国近代出版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of the deceased)^①中的记载,认为石印技术于道光八年(1828)被麦都思运用于中文书刊的印刷之中,在道光十三年(1833)传入广州。^②至于各单篇论文,更是就石印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于上海近代石印生产细节的认识,但对整体把握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如上海近代石印业的起讫与分期、近代特点、发展模式、石印业与铅印业的消长关系这些基础的理论问题至今尚未有文章进行探讨。

(二) 研究范围上,重晚清轻民国

目前学界对于上海近代石印生产的研究在时间段上不够均衡。《谷腾堡在上海》着力于晚清,而未涉及民国阶段。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原本探讨石印的内容不多,而在200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之际,由韩琦增补了不少内容,这些内容原载于韩琦、王扬宗的《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一文。韩、王认为石印业在清末就已经衰落,故而其研究对民国阶段阙而不论。张树栋等所著的《中华印刷通史(近代篇)》探讨石印亦限于晚清,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册)在民国阶段则只探讨了解放区的石印出版。而在评价上只有汪家熔的《中国印刷通史》对民国石印业的发展给予了有限的肯定。

(三) 研究对象上,重大型轻中小

近代上海出版石印书籍的书局概有三类:太平天国战后迁沪的江浙传统雕版书局,如扫叶山房、文瑞楼、抱芳阁、千顷堂等^③;石印书业兴起后新设的石印书局,如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等;综合型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出版企业的石印部。目前对于上海近代书局的研究,多集中在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一

①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96—97页。

③ “扫叶山房……太平天国军兴时代,又至上海彩衣街分设一店为总店。……后来又在河南路、南京路间设有扫叶山房北号。……苏州浦氏之绿荫堂亦分设分店文瑞楼来沪,如湖州吴氏之醉六堂、常熟鲍氏之抱芳阁、宁波之文玉山房及黄氏之千顷堂……均随至来沪营业。”参见上海档案馆(以下皆简称为“上档”):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3-1《行业历史沿革 1949—1956. 10. 9》。

些大型现代化出版企业,以及扫叶山房等传统书局之上^①,然而近代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②,为数众多的中小出版机构乃是构成上海书业环境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只是这些中小书局一没有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那样留下大量著作、在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书局经理人,二没有自己培养的诸多编辑人员的回忆录,^③三没有自己发行的刊物形成的舆论阵地,^④让后世的学者很难找到足够的史料对这些书局进行研究。几部印刷史著作中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大体相同,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研究的是点石斋、同文书局、解放区石印;《谷腾堡在上海》是点石斋、同文书局、董英馆;《中华印刷通史》是土山湾印刷所、点石斋、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一些中小石印书局很难进入研究者的法眼。

(四) 史料选择上,重因循轻开拓

《近代印刷术》中称点石斋石印书局技术来自于土山湾印书局,“土山湾印刷所之首办石印者,为法人翁相公(即翁寿祺——笔者注)及华人邱子昂二人……点石斋石印书局……开办之初,即聘土山湾印刷所之邱子昂为石印技术师”^⑤,后人谈石印技术的传播,多循此说。然而,此说除了《近代印刷术》一家之言外,并无旁证。从传教士方面的资料来看,《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中有一篇《江南育婴堂记》,中言邱子昂“十余年间,助翁相公管理印刷房,相帮不少”,至1899年才赴大德油厂襄助朱子尧,不提点石斋之事。^⑥所以邱子昂与点石斋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需要寻找更有力

^① 如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王学哲:《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版;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馆》,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等。

^② 《新书评骘》,《国民日报》1903年8月15日。

^③ 其中最典型的如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和《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等。

^④ 如商务印书馆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数十种刊物;而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即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号称“八大杂志”。

^⑤ 贺圣鼎、赖彦于:《近代印刷术》,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19页。

^⑥ 钟鸣旦等:《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1页。

的资料来佐证。现有研究著作所本之史料，大多见于各史料集成，而缺乏对旧有史料的使用及新觅之史料，如张元济的日记信札中有相当多关于商务印书馆石印部门生产的资料，这些资料就很少被石印史的研究者注意到；再如上海档案馆所藏“书业同业公会档”中有许多石印书局，甚至是民国时代石印书局的史料，这些资料现正在被作为上海书业行会的研究史料逐步出版，但是亦少见于研究著作中。

（五）在研究视野上，重单维轻比较

近代上海印刷业中，凸版、平版、凹版、孔版四大技术门类齐全，雕版、铅印、石印、珂罗版、雕刻凹版、照相凹版、誊写版^①等多种工艺互相辉映，但其主流还是铅印与石印之间的相互消长。从根本上说，铅印与石印都属于工业技术，在手工作坊小规模经营阶段，审美、习惯和技术因素共同决定工艺选择，而在进入产业化经营后，则主要是技术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整部上海近现代印刷史就是以石印、铅印、雕版印刷为主的几大印刷方式在“效率”和“成本”上相互竞争的历程。所以，对石印史的研究，必须参照着铅印技术的进步才能够理解其宠辱之谜。石印技术、石印出版机构、石印出版物内容的研究互相关联，不可偏颇。作为一种印刷方式，石印和整个出版行业息息相关，需要将编辑、印刷、市场三个要素统合起来研究才能理清石印在上海近现代印刷市场沉浮之状。

二、研究对象“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考辨

石印是平版印刷的一项工艺，德国人 A. 逊纳菲尔德(1771—1834)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的原理于 1798 年(嘉庆三年)发明，最初仅有反书绘石法，后逐渐发展出转写落石法、照相石印法、彩色石印法，乃至“擦笔水彩法”这种中国人所独创的石印工艺。

石印是一门印刷工艺，利用这项工艺进行印刷作业可以称为石印生产。石印生产的范围较广，个人性及团体性、实验性及行业性、公益性及经营性的石印作业都可以称为石印生产。而石印业则是一种由企业法人为经营主

^① 即油印。